



纪红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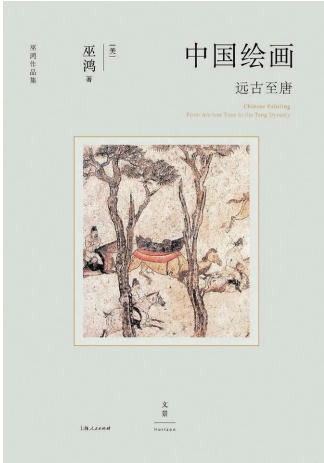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，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乡村振兴系列行动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，更是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。全面乡村振兴，是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共同发展、深入发展，不落一人一地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读长篇报告文学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》，会对精准扶贫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

易地扶贫搬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、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。可是，农民最牵挂的是土地！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。搬迁户刚刚离开生他养他、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，必然会经历阵痛。但这一切，又都被情感和温暖逐渐淹没。

鲁顺民、陈克海笔下的赵家洼是山西省岢岚县一个移民村，是整村移出去的。赵家洼村原来位于岢岚县西南部一条长3.5公里的狭长山沟内，全村54户115人。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22户44人。2017年9月，赵家洼村通过整体搬迁，搬出了大山，住进了新居，旧村整体实现了林进人退。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，2018年底，赵家洼村贫困乡

赵马观书



《中国绘画：远古至唐》最大的突破是打破传统中国绘画史以卷轴画为中心的叙事，将岩石、陶瓷、建筑上的图像都纳入考察范围。考虑到使用绘画材料的阶层性，这一视角的改变无异于将中国绘画的视野扩大到了一切图像，从而让无数无名画家的集体创作进入历史，改写了中国绘画史的格局与叙事模式，呈现给读者远古至唐的图像源流与风格变化。



《猛将还乡：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》
赵世瑜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《猛将还乡：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》，借助苏州太湖洞庭地区至今仍保有的“抬猛将”习俗，讲述了跨越千年的江南水上人的上岸史，梳理出一条新的叙述江南史的脉络。

所谓猛将，是自宋元以来太湖洞庭地区几乎村村户户供奉的神祇，在每年的正月或七月，各村或单独、或联合，都要举行“抬猛将”的活动。本书对照田野与历史文本，对这个流行千年风俗背后负载的历史传说“刘猛将”进行深挖。本书除了精彩的叙述和推断，还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讨论的学术话题，不但针对历史人类学、社会学，也涉及政治史和经济学史。



温情与力量 ——评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》

亲全部脱贫，实现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的工作目标。

这是一部感染力和可读性极强的报告文学作品。深入生活的采访，优美而细腻的文笔，丰沛而饱满的情感，这部作品从众多扶贫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。作者描述和刻画的陈福庆、曹元庆、周继平等扶贫干部，刘福有、王三女、曹六仁等村民形象，栩栩如生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赵家洼村子很小，人数不多，作者描写和刻画的人物也不算多。但作者将笔端向纵深开掘，将赵家洼村剖析得全面而深刻，特别是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了诸多人物的性格和命运。比如1947年出生的刘福有，他和妻子杨娥子带着母亲王花仁一起生活，户年收入不到5000元。听说要搬迁，一开始他非常担忧，怕进了城，因为自己年纪大了，挣不到钱，又没地可种，养不活自己。他想离开这个贫穷的大山，但又不敢离开。对于这个问题，驻村工作队早就在替他们考虑了。他们一边紧锣密鼓地给刘福有他们做搬迁的准备，一边则在城里马不停蹄地给他们“找营生”。最后，刘福有和妻子不仅住进了80平方米的新居，还都被安排到小区从事保洁工作。

其实刘福有本来叫刘有福，那一年乡派出所录名字，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，把他录成了“刘福有”。但村里人还是叫他“刘有

福”。不管是“福有”，还有“有福”，都是有福之人。而他们的“福”，除了自己的奋斗，也来自这个美好而伟大的时代。

虽然已经从脱贫攻坚迈向了乡村振兴，记录一个村庄脱贫历程的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》的文学韵味和思想力量，依然给人以激励与启迪。读完这部作品，我有两个鲜明的感受：其一，回望是温情。过去的赵家洼坡多沟长、土地贫瘠、灾害频繁。全村1308亩耕地中25°以上陡坡地就有904亩，生产条件恶劣；村庄破旧，房屋简陋，饮浅层渗井水，无集体经济收入，生活环境差；无动力电、无网络、无公交、无学校、无村卫生室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，是典型的“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”的深度贫困村。

但不论是笔者对赵家洼前世今生、因为贫困的出走、留守村民的贫困现状的描述，还是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、“安锅”时“吃糕”、搬进新居后的新生活的刻画，都充满着温情。在贫困的酸楚中，在奋斗的艰辛中，始终可以感受到向真、向善、向美、向上的力量。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基调和灵魂。

其二，征程有力量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，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》同样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赵家洼村民的未来。虽然这个村子已经林进人退，回归了大自然，但村魂还在。搬到集中安置

点的村民，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妥善安置，让他们搬得出，稳得住，能致富，还让他们逐渐融入了城镇生活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，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。像刘福有一样，王三女、曹六仁、张秀清等人也都找到了“营生”干。他们在经济上可以一时贫困，但他们的精神却不贫困。他们身上有着中国农民的朴素、吃苦耐劳、勤劳勇敢、善良质朴。而这种温暖，这种力量，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。

（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》，鲁顺民、陈克海 著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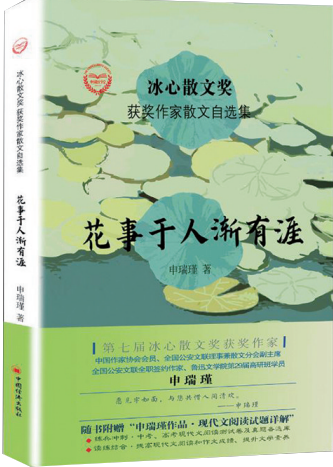


梅骨莲心 ——申瑞瑾散文印象

徐迅

尽管只见过申瑞瑾一两回，但读她的文字，恍若她就在眼前。大家静静地听她谈茶、谈莲、谈荷，谈她走过的山水和她的至亲至爱……她绘声绘色，快人快语中又极有分寸。这分寸里既有她对苍茫世事的拿捏与体悟，也有她对个体生命的宽容与体谅。文如其人，她的文字总有一种灵魂的迷离与寻找，当然还有一副隐约浮动的梅骨莲心。

她写得多的确实是茶，是莲，是荷。她喜欢茶，也很懂一些茶道，这就不必说了。她对荷莲的喜爱让人就很惊奇。在她认为，看荷是她夏日里必有一场盛筵：“红的、粉的、白的荷，全像天鹅般地伸着颈……袅娜着，纤弱着，盼望着，出尘不染着”。她对荷莲的爱近乎痴迷。比如，在太原的晋祠，



好书摘读

中国文化 不曾“断裂”的内在根据

李中华

政治的连续性是中国文化不曾发生“断裂”的内在根据。政治的连续性是指政治传统的继承性。

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夏、商、周三代甚至更早。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是中国青铜时代小邦林立时期。三代的王不过是不同规模的邦的联盟的首领。这三代在中国上古史上相启相承、相袭相革，至秦汉始完成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体化。

就当时东部地区为例，鲁国是保存古代文化最得力的国家。其实早在殷代以前，这一地区是风偃东夷集团聚居之所。风偃旧族可追溯到太皞、蚩尤时代，虽经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风云洗礼，他们的社会结构、经济、政治制度却几乎没有变化。同样，西部、中部及南部地区亦如此。

正是出于这种原因，当周天子取代殷商政权时，不得不采用灵活政策，对仍保存传统民族结构的各诸侯国，因地制宜地分别“启以商政”或“启以夏政”。这即是《尚书·康诰》“显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罚，不敢侮齔寡”及孔子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真实含义。不仅传统的氏族社会的政治结构，而且刑罚律令也都因袭殷法，即所谓“师兹殷罚有伦”，“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”（《尚书·康诰》）等皆是。这就是说，周在克商以后，不仅没有

打断商的政治传统，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在继承它。

东周时期，北方的戎狄和南方的蛮夷（楚）逐渐强盛，曾一度威胁诸夏的安全。齐桓、晋文先后提出“尊王攘夷”的口号，代替周王继续推行原有的政治传统。

秦汉时期，中国政治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变化，由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，但这并不是由政治“断裂”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并不是由中国之外新起的征服者代替原有的征服者，它不像与秦汉同时期的希腊诸邦完全是被它以外的罗马所征服。秦汉时期的中国，总体上依然承袭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，只是在中国内部从政治组织形式上有一种新的调整，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当时的发展。

郡县制代替分封制，是中国内部自发的调整机制，它是同一民族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，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中国固有的宗法社会性质。因此，秦汉帝国的产生是建立在内部征服而非外力征服上的。因为那时的中国，早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。早在殷周时代，中国的国家体制即已逐渐完成；而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，显然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部分的对立。这种外部征服与对立的结果，不仅使政治形态发生了变化，而且整个国家和文化传统都发生了“断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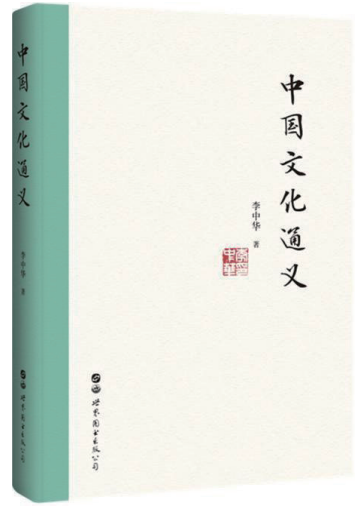
东汉以后，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时期。但与上面的历史发展极为

时就这样直面人的死亡。她对生命也有自己的心得。她说，“有时一个念想或一个决定，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”，而“命运推着你跌跌撞撞前行，一些人能奔向大海，一些人终抵大漠”。

然而，她终究又是容易“逃离”的。她的这种迷离在文字里也经常出现。比如在周庄，有那么一刻，她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主人，坐在向阳的木格子窗前，泡着上好的杭州胎菊。还有一双聪明伶俐的儿女，儿女放学归家时会喊一声她：“娘，今晚有什么好吃的？”（《柔软的周庄》）。在湖南新化的紫鹊界，她又感觉自己便是那某户人家初长成的女孩，与姐妹们围着母亲学做女红，调皮的她总是绣不好一只鸟一朵花……（《九月的紫鹊界》）。而在《带泪的溪砚》里，她干脆就认为自己是砚老板家的四小姐了。年轻砚工就是她“暗暗喜欢的人”。然而在绣楼上，她却接住了一个面白身长的书生的笑容……出嫁时，父亲为她陪嫁了砚台，一方刻了一株带露珠荷的砚台。在那荷上，她看到了砚工眼角的一滴清泪……看山观水，不知不觉她就把自己嵌了进去，仿若她在寻觅自己的灵魂，又在灵魂中观照人生。这就有些迷离、浪漫而古典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那一年在鲁迅文学院，我和另两位老师受邀在她们班上讨论散文，她却不在课堂的事。后来见面，她告诉我，那天她有事出去了。现在读她的文字，我却相信那天十有八九也是因为迷离，她出去寻寻觅觅了。

（《花事于人渐有涯》，申瑞瑾著，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）



相似，由三国至西晋统一，再由晋室南迁而至南北对峙，可以说仍是一种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变动，而非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转移。北朝的十六国，虽多为少数部族建立的政权，但从性质上说，他们所推行的各种制度都完全采自中国古代典籍或“依晋代九班选制”。在保持儒家传统方面甚至比南朝更显纯粹和得力。因此当时北朝的政治生活、社会生活、文化信仰可以说仍然承袭着汉代以来的传统，其中的变动亦可看作是一种内部的调节机制，而非新的征服者所建立起来的新制度。

从殷周至清末，中国的政治乃是一贯的民族传统，可以说未曾发生“外层断裂”，它是通过不断进行“内部调整”的方式而达到一种“超稳定”的完整架构。

（摘自《中国文化通义》，李中华 著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）

徐启华

阮梅新作《一个女孩朝前走》，从出版到现在，仅仅半年时间，就成了读书界的热点，走入了众多的学校和千千万万的家庭。一本普通的少儿读物，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，在当今这个读图看“屏”的时代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。

《一个女孩朝前走》中的平凡英雄黄文秀，出生在广西的一个贫困家庭，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女孩，成长为时代楷模，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巨大的。其中，爱的熏陶尤其重要。

书中那一个个爱的故事，像一缕缕各不相同的单色棉线，编织成了一幅美丽精致的爱的壮锦。

文秀妈妈精神接近失常，视力几乎失明，常常为家庭添乱。父亲黄忠杰苦闷硬做，终于有了近3000元积蓄。但文秀妈妈在放牛时，没有理由的放火烧地，被林业派出所罚款5000元。黄忠杰生气，愤怒，甚至想把老婆送回老家，但在儿女们的哀求下，爸爸“怒气早消去一半。”“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，一个哀伤的家，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。”

家里的两匹矮马，是黄忠杰劳动的好帮手，被他当儿子一样养着。它们也是孩子们的好伙伴。

不久，妈妈又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：她把漂亮盒子里的农药当做好吃的东西喂给大矮马吃了。大矮马看着爸爸，一滴泪水从它圆睁的眼睛里流出，离开了这个家庭。爸爸任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样阵阵堵在胸口，漫过喉咙，硬生生用闭紧的双目把他们压下去：“算了吧，大不了再买一匹。”毕竟亲情比什么都宝贵啊！

爷爷奶奶为了这个家庭，在风烛残年，仍然不辞辛苦地劳累着，对孩子们无微不至地疼爱着，孩子们对爷爷奶奶的依恋，对病中爷爷的牵挂，对奶奶去世的悲伤，每一个细节，都让读者感同身受。

亲友与邻里的理解帮助，支持黄家渡过了一次次难关，构成了社会和睦善良的背景底色。

文秀兄妹三个，热爱大山，热爱山上的草木、花果、鸟兽。

是爱，给了文秀一家向往美好生活的勇气与力量，也为黄文秀的成长提供了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人生养分。

为了改变家乡和家庭的困窘现状，黄忠杰想能够像邻村人能人莫文珍一样，带领家乡人种芒果，奔小康。但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，实现不了理想后，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老家，搬迁到城区，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而又曲折的奋斗之路。

黄忠杰的创业史，就是不断进取、不断失利和继续进取的人生奋斗史。他当过建筑包头，种过甘蔗、芒果，都因各种原因，失败了。

儿子茂益不适合读书。送他学艺，学艺不成；送他当兵，体检不合格，最后成为司机，终于能够自食其力。大女儿娟儿大学毕业，在柳州工作。

文秀则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农家小女孩成为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。读完研究生，她却放弃优厚的城市工作，回到家乡，带领贫困山区的亲人们脱贫致富。最后，她以身殉职，把美丽身影永远留在了生她养她的大山里，留在了爱她想她的乡亲们心中。

黄文秀的成长与家庭的影响密切相关。作者这本书的创作意图应该就在这里。

黄家掌门人黄忠杰从未妥协言败，屡跌屡起，不停反抗命运的阻击。为了摆脱贫困，为了子女幸福的明天，他步履虽然蹒跚，但却一步一步朝前进发。这种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精神，就是夸父追日的民族精神。这种精神饱含血性，饱含斗志。而支撑其后的力量，就是一个“爱”字。

一个不爱家的人，能爱村民乃至更多的他人吗？邻里之爱，故乡之爱（黄父一直想成为能人带领乡亲致富对文秀的影响应该最深），对山水自然之爱（他们已与自然融为一体，是山之子，也是山之魂），构成了黄文秀学成回乡，奉献青春的原因与灵魂深处的动因。这些娓娓道来看似琐碎的叙述描写，实是草蛇灰线，预伏了秀儿成为“黄文秀”的坚实背景。这些都在作者的不动声色中布局完成，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，实则水乳交融，妙合无痕。

黄文秀的学习与人生选择，无一不投射了这种深沉的爱与刚毅不挠的追求精神。这种爱与坚持、奉献的精神，对广大的小读者来说，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。对他们的学习、生活、工作，乃至献身自己的事业，其励志作用是不可小视的。

（《一个女孩朝前走》阮梅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）

